

第六章

結論

以上第一章至第五章，本研究透過「策略-關係途徑」，並且以相當的篇幅與內容探討，台灣由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以至於民主鞏固階段的各階段中，社會運動如何藉由外部策略的操作，使社會運動能突破結構的限制，進而成爲一種引起國家憲政風暴或是廣泛社會動盪的「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雖然本研究並非採取一個明確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研究設計，而較爲強調結構、策略、以及行動者的三方互動過程。然而，經過兩個特殊型態社會運動的案例研究，已經可以進一步觀察出「民主化」與「社會運動策略」兩者宏觀的因果關係，即是民主化過程中國家結構的變遷與制度化過程、以及民主化逐步鞏固的各項人民與社會權利，都成爲了社會運動尋求一種策略自主性(strategy autonomy)的來源，也是形塑「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

一、「反核四抗爭運動」之研究發現

本研究於第二章與第三章部份，首先探討「反核四抗爭運動」這個獨特的「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案例之興起背景與發展過程。並且藉由下【表 6-1】，我們首先對「反核四抗爭運動」各階段的研究發現進行精要的彙整。

【表 6-1】「反核四抗爭運動」各階段彙整

威權前期 (1950~1972)	
霸權計畫	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之「反攻大陸」使命。
國家-社會關係	國家機器透過各種權力行使與制度管道，對社會進行強而有力的支配。
核能政策	以發展爲「核武」目標。
威權後期 (1972~1987)	
霸權計畫	行使威權政治，並以發展經濟作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統治正當性基礎。

國家-社會關係	延續「威權前期」的統治基礎，但由於長期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力」的湧現；政治上也出現「黨外勢力」與國民黨政權對抗，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出現政治危機，緩步進行政治改革而進入「軟性威權主義」階段，而呈現社會力量上升、國家力量衰退的趨勢。
核能政策	以發展為「核電」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並成功度過兩次石油危機；但仍不放棄發展核武，。
反核組織	核能學者與「黨外勢力」結合。
反核外部策略	形式上透過教授下鄉、草根動員；實質上以「社會運動政治化」的途徑累積影響力。
反核行動場域	在戒嚴體制之下壓制社會運動自主性，而限於社會邊陲。
反核結構限制	集會、言論自由都遭受戒嚴體制的限制。
反核行動結果	一九八五年舉辦「核電大辯論」成功擱置核四案。
政治自由化時期 (1988~1992)	
霸權計畫	國民黨威權統治集團，透過政治上的解嚴，開始放鬆對自主性動員以及民間組織的嚴密控制。但國民黨並非將自由化作為一種國家的「霸權計畫」，而是作為威權政體傾頹時的一種非自願的工具性妥協。
國家-社會關係	解嚴後社會力持續上升，郝柏村提出「掃蕩社運流氓、重振公權力」的施政口號，強力通過各項重大建設。
核能政策	郝柏村統合國家機器中的行政與立法部門，重新啟動核四興建程序，核四預算解凍並引發「一〇〇三事件」。
反核組織	環境保護聯盟、鹽寮反核自救會、民進黨。
反核外部策略	地方政黨輪替，尤清當選台北縣長，藉由地方首長的行政資源，配合地方自治的權限，以創造反核四抗爭運動的策略操作空間。
反核行動場域	地方政府與社會街頭抗爭。
反核結構限制	地方行政首長只能進行杯葛，無法實質影響中央政策。
反核行動結果	確立反核四抗爭運動將更加依賴「國會遊說」的途徑，透過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作為使核四預算案解套的對抗策略。
民主化時期 (1992~2000)	
霸權計畫	以民主化作為霸權計畫，藉由逐步的憲政改革以及常態性選舉的推動，作為鞏固國家機器的機制。

國家-社會關係	民主化的過程具備一個「國家-社會」關係的實質意義轉變。位處社會的一方得以藉由政治權利賦予，而透過的政黨競爭制度、有效且定期的選舉等民主機制，影響國家政策、或甚進入國家體系制定政策。而國家機器也有義務增進、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居住遷徙自由等相關自由權利，以確保社會運作的自主性。
反核組織	環境保護聯盟、鹽寮反核自救會，民進黨為主要代理人。
反核外部策略	與民進黨立法委員結盟，反核四團體在第二屆立委任期之初的策略是希望在立法院內外施壓、對國民黨立委軟硬兼施。而後推動「罷免擁核立委」並由地方舉辦「反核公投」以作為爭取自主性與自我延續的行動策略。 反核四團體在第三屆立委任期繼續與民進黨立法委員結盟，並結合從國民黨分裂的新黨通過
反核行動場域	立法院與社會街頭抗爭。
反核結構限制	雖然出現國民黨分裂的政治機會，但在國會中仍受到「政黨比例」的結構性限制，並且執政黨只要掌握三分之一席次的立委就能通過「覆議案」。
反核行動結果	第三屆立委任期與新黨聯合通過「廢建核四」，但遭受國民黨以「核四覆議案」否決，也使地方反核組織與民進黨結盟關係遭受打擊。民間反核組織也宣布「告別議會，就地抗爭」。
民主鞏固時期 (2000~)	
霸權計畫	繼續以民主化作為國家首要霸權計畫，但結構性調整幾已完成。
國家-社會關係	同「民主化階段」。
反核組織	環境保護聯盟、鹽寮反核自救會、民進黨。
反核外部策略	民進黨政府並未採用既有的「口袋策略」，而透過行政部門召開「核四再評估會議」後，由行政院長張俊雄宣布核四停建。
反核行動場域	國家核心
反核結構限制	政黨輪替的新政府面對舊國會的制肘。
反核行動結果	引發憲政風暴，最後透過大法官解釋，政黨協商後核四續建。最終以「非核家園」的共識收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作者自行整理。

藉由上【表 6-1】的彙整，也驗證了本文最出所做出的假設：「社會運動若能在特定結構之下運用得宜的策略，國家即無法透過各種管道收編、制度化社會運動。」而「反核四抗爭運動」一開始即採取「政黨結盟」的策略，由於反核四運動所採取的策略能夠充分利用國家霸權計畫所釋放出的「政治機會」，因此在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各個階段，皆能透過民主化結構變遷中所釋出的策略操作空間，以民主的手段不斷推升「反核四抗爭運動」的行動場域，從社會、國家機器邊垂，一路挺進至國家機器核心。雖然在各階段當中仍存在重重的「結構限制」，但藉由外部策略的操作，仍能創造社運的自主性空間，終於「以國家為槓桿」形成一個「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而本文認為「反核四抗爭運動」的發展始末，也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發展的獨特經驗。

另外，本研究認為「反核四抗爭運動」的外部策略，在「威權後期階段」、「政治自由化階段」以及「民主化階段」，在策略軸線的發展上充分呈現出一種「路徑依賴」(path independent)的特質。因此，在各階段當中外部策略所累積的能量，皆得以成功轉進至下一個階段當中，並與外在環境持續互動。然而，在「民主鞏固階段」當中「反核四抗爭運動」卻放棄若干曾經採用過的「口袋策略」，而採取一個不被當時政治環境所接受的外部略，因此使得該階段本來所醞釀之「政治機會」喪失殆盡。另外，民進黨執政後，民進黨的角色從反核組織的戰友轉變為反核組織監督之對象，這個權力位置的轉變造成社會運動失焦的困境，也使得「反核四抗爭運動」在「資源動員」面向當中得社會動員能力大打折扣。而這個現象是否是「以國家為槓桿」的社會運動發展到最終必然要面對的「魔咒」³⁰³，則是本研究未來關注的方向。

二、「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之研究發現

本研究接續於第四章與第五章探討第二個「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案例：「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本文研究發現，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後的暴力事件以及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後的社會動盪，都暗示了政黨輪替後台灣隱藏著民主逆流的危機，Huntington 也指出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鞏固階段普遍存在著一種「威權懷舊情節」，而「貪腐」最終成為扼殺民主的主要因素。由於「反貪腐紅衫軍倒扁運動」所處的時空背景已經接近國家霸權計畫：民主化的完成階段，國家政體轉型過程中民主體制的建立大抵完備並且常態化運作，並且確保了高度的言論自由、新聞傳播自由、

³⁰³ 吳介民(2002)認為，此現象是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所面臨集體困境，並稱之為「克勞塞維茲的魔咒」。

以及集會結社自由。因此，從一個「策略-關係」的角度出發，「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亦得以在缺乏政治機會的條件之下，另闢蹊徑選擇一個以「大眾傳播媒體」為槓桿的社會運動策略路徑，進而形塑一個「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風潮。

在「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的「運動醞釀期」中，由於施明德個人「英雄化」的人格特質與「戲劇化」的政治生涯，使得「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先天上即擁有充分的新聞題材，因此迅速的成為媒體注目的焦點。加上「倒扁總部」在「組織制度化的程度」、「財務基礎」、以及「文化資本」的面向上，皆具備了優越的條件。因此，「倒扁總部」在「運動醞釀期」階段當中，一方面能在議題的詮釋上取得主導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能成功的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大幅度報導將其社運的訴求與框架傳遞至民眾的心中，而展現其於大眾傳播媒體平台的影響力。藉由這個先天的「媒體近用」條件，「倒扁總部」得以在這段時間內迅速進行資源動員的預備工作。「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在「運動醞釀期」中，最主要的策略性目標即是匯集「百萬人民倒扁承諾金」，這個資源動員的策略巧妙的以大眾媒體將為媒介，將倒扁的「正當性」與「社會資源」作一個相當有效的匯集與聚焦。

然而，但當社運組織所發布的消息來源與媒體本身的立場和新聞框架有所衝突或甚背道而馳時，媒體即有可能進行議題設定，加以曲解或轉化社運組織原始設定的議題，而對社運的動員與發展造成傷害。為了更進一步強化「媒體近用」的影響力，「倒扁總部」也藉由「善用媒體間之競爭環境」、「利用資訊津貼之方式」、「使用專家撰稿爭取議題建構的機會」、「監看及立即回應媒體報導」、「製造具新聞價值的行為，以增加媒體曝光機會」、「以道德訴求贏取記者的同情及認同」等六項「媒介策略」的施展，盡可能的使上述所稱之狀況不要發生，或是降低其所造成之衝擊。

成功募得超過一億元的「百萬人民倒扁承諾金」後，「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進入了「黃金動員期」階段，此階段的策略性目標是要凝聚龐大的「共識動員」能量，進而使社運的「診斷框架」得以實現、「預測框架」得以形成具有正當性的社會行動、「動機框架」得以喚起百萬公民的熱情使之走上街頭。首先，在「直接共識動員」的面向上，研究發現「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藉由資訊科技普及與網際網路發達的條件，因此得以直接藉由「百萬人民倒扁網站」進行資訊發送與交流，而突破傳統社運共識動員上的限制與困境。本研究也針對「百萬人民倒扁網站」當中的「百萬人民倒扁日記」部分，進行內容分析。我們發現，在運動的黃金動員階段當中，「倒扁總部」總指揮施明德每日均撰寫「百萬人民倒扁日記」，並

公開於「百萬人民倒扁網站」，可以視為「倒扁總部」進行「直接共識動員」的重要機制，並且具有「議題延伸、擴大基礎」、「掃除障礙、化解危機」、「強化正當性、鼓舞士氣」等三個重要的任務，以維繫直接共識動員的強度。

另一方面，在「間接共識動員」的面向上，本研究針對了倒扁黃金動員期間平面媒體「倒扁」報導數量進行統計、以及倒扁黃金動員期間國內三大平面媒體時評與社論報導之統計，研究發現針對「倒扁」相關議題，三大平面媒體所刊載之「時評」與「社論」，在內容方面呈現了「極端」並且「對立」的核心新聞框架，反映出本文曾經在理論部分所提及「大眾傳播媒體是策略鬥爭的場域」的現象，突顯媒體本身存在其「報導立場」，也反映出「台灣媒體生態的特殊性」。即便是如此，這股倒扁黃金動員期間內報導的熱潮，亦相當程度的幫助「倒扁總部」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創造了有利於「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的社會輿論條件、並維持社運的熱度，進而促進「倒扁總部」的「間接共識動員」。

綜合「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在「黃金動員期」階段內所進行的共識動員工作，本研究也認為，「直接共識動員」與「間接共識動員」之間，並非存在涇渭分明、相互獨立發展的關係。倒扁總部的「直接共識動員」與「間接共識動員」工作是交錯混合進行的。而二者又能相輔相成而能產生出共識動員的「縱效」，這也是「倒扁總部」在共識動員這個面向極為成功之處。

在「運動醞釀期」與「黃金動員期」後，「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正式進入「動員高峰期」，為了延續社運的生命週期與龐大的動員能量，以及避免社運「未起先衰」，在此階段「議題框架」扮演了議題聚焦、鼓舞參與者士氣以及社運障礙等重要的角色。「反貪倒扁總部」分別先後操作了「紅衫」、「禮義廉恥」、「納斯卡線」、「螢光圍城」、「遍地開花」、「天下圍攻」等六個議題框架。而這些議題框架，皆環繞著「反貪倒扁」的核心訴求，並且扮演「框架聯盟」的重要角色，以達到聚焦運動核心、喚起參與者熱情、維持運動士氣等目標。上述六個議題框架也交織成「九九運動」、「螢光圍城」、以及「天下圍攻」等三場台灣社運史上史無前例的集會遊行動員。本研究回顧了六個議題框架的成因、發展與影響後，進而探討「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動員高峰期的媒體角色，研究發現「紅衫」之議題框架，幾乎成為「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的代名詞，媒體並開始以「紅衫軍」稱之。因此，我們也觀察到國內三大平面媒體對於「紅衫」的報導頻率，與「反貪倒扁總部」的動員高峰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而「紅衫」議題在國內三大平面媒體的報導頻率的起落也等同於「紅衫軍反貪腐

倒扁運動」的社運生命週期。而另外在「禮義廉恥」、「納斯卡線」、「螢光圍城」等三個議題當中，研究發現這三個議題在平面媒體上的生命週期比起「紅衫」顯的較為短促，進而推論出這三個議題框架皆是以「輔助」之性質為主要目的，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設計出新穎的議題框架，進而吸引媒體與群眾的好奇心，以強化運動的動員能量。另一方面，在這三個議題框架中，似乎較吸引聯合報以及中國時報兩家平面媒體，自由時報的報導頻率則落居最後。

由於「遍地開花」環台的期間，突發民視製作新聞專題的「抹紅」事件，引發媒體之間的論戰，而「遍地開花」的過程中也時常引發群眾衝突或是緊張對峙的事件。因此，國內三大平面媒體皆爭相進行報導，其中自由時報也一反「納斯卡線」與「螢光圍城」的低調報導，而出現報導頻率上升的現象。本研究也認為「遍地開花」也成功了扮演了「螢光圍城」至「天下圍攻」期間長達約二十五天的新聞聚焦角色。最後，研究發現「天下圍攻」被視為「倒扁三部曲」的終部曲，「反貪倒扁總部」不惜以非法集會遊行的手段，作為促成「二次罷免」在立法院闖關的手段，加上「天下圍攻」本身即具備高度的新聞報導價值，因此國內三大平面媒體針對「天下圍攻」之議題框架，也都不約而同的出現報導頻率的高峰。

綜上所述，在「運動醞釀期」以及「黃金動員期」的籌備與發展，「反貪倒扁總部」在「動員高峰期」階段當中已然具備了「媒體近用」的權力。另一方面，媒體也在運動中成功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使訊息得以迅速的傳遞，讓「反貪倒扁總部」得以持續進行高密度的動員工作，以維持延續社運的生命週期，進而展現一種「以媒體為槓桿」的獨特社會運動形貌。

三、「理論部分」之研究發現

藉由以上的討論，簡要的回顧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兩個特殊型態的社會運動。然而在本研究的最後仍必須特別強調，由於「反核」的議題以及「反貪腐」的議題所產生的社會運動風潮，在發生的當下或多或少都隱含著一些「政治性的價值引導」。因此，本研究盡可能的不涉入討論社會運動所訴求的價值與正當性，而把研究焦點放在「社會運動在特定時空所採取特定策略，是否有助於社會運動的壯大與延續？」

首先，本研究認為「策略-關係途徑」可以作為一個觀察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良好途徑，特別是在宏觀的研究取向而資料來源又是以二手資料為主的資源條件時，也能夠進行動態的分析。而「策略-關係途徑」在權力的認

知上採取一個非結構化的角度，其以「策略」作為行動主體創造自主性的分析起點，特別是將「國家」以及「大眾媒體平台」視為一個策略鬥爭的場域的觀點，也使得本研究得以藉由「策略的角度」調和「國家」、「社會」、以及「社會運動組織」這三個構面，進而使本研究能配合「民主化」這個重要的歷史發展軸線，進行相關之考察與論述。

再者，本研究從一個策略的出發點，也試圖對「社會運動」的定義賦予一個新的註解。本文認為「社會運動是一種集體對國家進行策略的施展，藉由與國家策略互動的過程，試圖建立與國家更為親近的社會關係，進而達到其所欲求之目標。」而在概念上，本研究也認為民主化開啓社會運動的生命力，民主化使社會運動從「指向民族國家」演變為「指向國家核心」之可能。「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指涉一種藉由社運組織或其代理人藉由策略的施展，進而突破結構限制，最終引起國家憲政風暴或是廣泛社會動盪的社會運動。而本研究以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作為重要背景因素進行探討，也分別指出了兩種「以國家為槓桿」以及「以大眾媒體為槓桿」的「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也希望這個社會運動策略取向的定義，以及上述概念的新詮釋，能夠更加豐富化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研究的領域，也期盼能給予未來的研究者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思考方向。